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〇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〇期 ——
(二〇一〇年十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010b)

【研究报告】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李 逊
【童年旧事】	文革除了运动没有任何文化	叶兆言
【往事如烟】	农民造反记	张治凡
【史实辨正】	请勿轻易下结论——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	薛开震
【史海钩沉】	毛远新与 1 9 7 5 批判邓小平	金冲及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革命的粗野

•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 李 逊 •

(作者注：原作英文版发表于 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 #2, July 1993; 中文版发表于广州社会科学院 1 9 9 4 年《开放时代》杂志社“开放时代之二”《现代与传统》。)

对于这一先前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本文将简要地思考文化革命语言的几个方面。这些方面首先是在年轻的红卫兵的文章和演说中成形的。我们所触及的问题包括：红卫兵的粗野的骂话，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泛滥的军事用语，喻体变成了本体，模仿与阿谀的文体，简单的三段论推理，生造的工人语言，底层语言的反规范趋向。虽然里面每一个特征都已引起先前研究者的注意，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与这些语言活动有关的一些重要线索——至少在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如此——那就是他们的粗野。使用咒骂和其他粗野语言是年轻的造反学生们的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为的是使用他们所认为的大众革命语言。

近来对革命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同上一代学者相比，集中在对这种革命文化和多侧面的

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因此学者罗伯特·达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对于18世纪法国研究的著作《意识形态史》中分章论述了农民、城市手艺人、资产阶级、警察、以及知识分子。结果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表现各自明显异的思维、语言和行动模式。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个例子中，这一种社会差别至今似乎没人深入地研究过。我们在本文结尾部分将学生和工人进行比较，就是意在使这个重要问题引起讨论。不过，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命名似乎有些语言错误。在文化革命运动后期的舞台上，工人是重要的；但是，这一时期文化转型——反映在语言变化上——大多是粗野的年青学生造成的。尽管他们为的是显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但这些小知识分子张扬的这种类型的语言事实上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语言相距甚远。

◇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

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卫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

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

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

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大打一场X X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合”、“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方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1967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19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 泛滥的军事用语

与这一类语言同时流行的，还有军事语言。军事语言的膨胀，与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关——红卫兵最初便是以身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而树立了闻名于世的好斗形象——也与文化革命前

夕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有关。不过，更早还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期。当时，共产党的大批部队军人转入地方工作，将军队的一些专门用语转用到地方工作中。诸如将工作的具体职业工种称作“岗位”，将重要而又艰苦的工作称为“最前线”，将消除某种现象称为“发起进攻”，等等。但只有到了文化革命这个全民崇武的年代，这种语言才一下泛滥：“万饱齐轰”、“猛烈开火”、“打响战斗”、“提供炮弹”、“吹响进军号”、“放好哨，站好岗”。除了这类以军事语言作为比喻或转借，更直接的运用便是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的命名。从最初的“战斗小组”，到以后的“纵队”、“指挥部”、“司令部”、“兵团”、“野战兵团”、“红卫兵军区”，等等，无一不是对军队编制的直接模仿。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兵营，穿着军装的人们按不同观点组织起以军队编制命名的组织，甚至像军队那样真枪实弹地开火打派仗。对军队的崇拜到1967夏天已发展成为对武力扩张的崇拜，以至于许多地方的造反组织与正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在青海、武汉、四川等地，几乎演成真正的内战。

与此种军事语言相联系的便是强权式的命令语气或文体：“XXX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还有那铺天盖地的“通令”、“通告”、“勒令”、“紧急通令”、“严正声明”。一纸通令便是由一个或几个造反组织自定的“必须”、“不得”、“严禁”，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措词的激烈，语气的蛮横，远远超出这一类文体原有的表达程度，成为文革中常见而特殊的语言现象。

◇ 喻体变成了本体

如果说，粗野、激烈及军事化用词还只是文革语言的修辞方式或表达方式；那么，由这种修辞表达方式形成的语言符号所带来的另一个语言现象则将使后人不可理解。这种现象便是文革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喻体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本体。

文革的思想方式是简单而绝对的，没有妥协、折中的余地。事物只有好或坏，思想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同志或敌人。这种两极式的思维方式很容易以形象的语言形容表达，文革前便已见端倪的色彩符号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革命，由此，产生许多文革新词：“红卫兵”、“红太阳”、“红宝书”、“红司令”、“红小兵”、“红心”、“红色服务员”、“红色工人”、“红色江山”、“红色造反”、“红色夺权”、“红五类”；“黑帮”、“黑话”、“黑书”、“黑会”、“黑手”、“黑风”、“黑七类”、“黑后台”、“黑材料”“黑指示”，等等。与此相类似的形容或比喻还有“香”、“臭”，“东风”、“西风”等等。

这些词汇，有些在文革前便已运用。如以“红太阳”比喻毛泽东，以“东风”和“西风”分别比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只有在文革这种形而上学极端化的时代中，这些借用的比喻体，才会成为被比喻者本身。“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东风”就是社会主义，喻体等同于被喻体，成了本体。作家邓拓写散文说太阳上也有黑子，文革中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毛主席”而遭到批判；一个农民在地里干活时说了句“今天西风刮得好大，压倒了东风”，被说成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竟遭到关押。这种由崇拜某一人物或事物而扩大到对这一人物或事物比喻体的崇拜现象，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时代。文化革命中的文字狱甚至超过了文字狱盛行的清朝。在文革中连对“猫”的虐待也会被控为“反革命”，因为“猫”、“毛”同音。打猫、杀猫会被视为“极端反动”的行为而招至祸殃。

◇ 模仿及阿谀的文体

除了用词造句方面的显著特点之外，文化革命中的语言尤其是书面政治语言，在文体方面的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权威人物尤其是毛泽东文风、句式和论理方式的模仿。文革中引用毛的语录和诗词蔚然成风，毛泽东年青时写的《〈湘江评论〉创

刊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被到处套用，诸如“大权者，我们的大权。我们不夺，谁夺？”不一而足。不但如此，许多文章整篇都是对毛的一些文章的直接模仿，也即将毛原文中的一些词句改换成文化革命流行词句，而原文的文章格式基本不变。被模仿得最多的文章是毛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著名讲话《反对自由主义》，以及解放战争中对国民党将领的劝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前者一般用于分析造反派内部存在的问题，后者则专用于对付“走资派”、“小爬虫”，或者与自己组织对立的其他组织。此外，当时官方报刊上的社论，也是传单小报竞相模仿的范本。不过这种模仿一般只是仿造其中的一些段落或者干脆照抄，而不是全文模仿或照抄。

造成这股模仿风的原因有二个。一是由于毛泽东文章诗词本身所具有的文彩以及毛泽东政论文所特有的雄辩，与文化革命政论文打倒对手所需要的气势正相吻合；二是模仿领袖人物文章和官方社论可以躲避当时无处不在的文字风险。

文革语言中，文体方面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体现在阿谀谄媚却又矫揉造作的文风。这种文风是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兴起的，主要表现于各种给毛泽东的“致敬电”或“献忠心书”中。这类文章非常讲究修辞手法，通篇皆是排比、对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骈赋，却又没有古代骈赋那样深厚的语言功力，倒更像古代呈给皇帝的称颂文策。最常见的句子有：“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您的恩情深”，“谁拥护您，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您，我们就和他拼”，“天变地变，我们忠于您的红心不变；地动山摇，我们高举您光辉思想伟大红旗的决心不动摇”，等等。辞藻虽然华丽，但却空洞做作。1967年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的“致敬电”，全部都是这种风格，无一例外。

◇ 简单的三段论推理

遣词造句和文体是语言的外在形式，而逻辑推理则可以说是语言的内在结构。文革语言的逻辑推理是简单三段论式的，最典型的推论过程便是：“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反革命，你反对毛泽东思想，你就是反革命”。另一种典型的推论过程是造反派用于自己的“我们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支持的就是革命的，你反对我们造反派，你就是反革命！”文革中几乎所有的辩论文章用的都是这样的逻辑结构。看上去似乎十分雄辩，但大前提却首先是虚假的，而正是对这种虚假的大前提，不容怀疑，不容讨论，仿佛这种前提就是先验地正确。这使得文革中所有的文章都显得简单、武断而又强词夺理，以势压人。

至于文革后期的那种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式的自我称颂，已经连推论过程都不要了。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反映。武断而非此即彼的语言形式，反映了文革时期思维的僵化。

◇ 生造的工人语言

比起学生红卫兵的语言，工人造反派的语言缺乏自己的个性色彩，不象红卫兵语言，经常制造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工人造反派的语言与其说是朴实，不如说是平庸。而当时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以工人造反派名义散发的传单和文章，绝大多数是红卫兵或文化革命前的机关干部起草的。工人造反派限于受教育水平，他们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报刊上登载的文章大多由秘书起草。如王洪文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秘书，都是学生红卫兵及前机关干部。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自己在一些会议上的即席发言，从笔者所能看到的记录稿都十分平庸，既缺乏思想深度，也缺乏红卫兵的煽动力。

1968年底。毛泽东通过姚文元文章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工宣队”被派往学校机关及一切毛所称为“上层建筑”的领域；与此同时，红卫兵则面临着毕业分配。

大多数中学红卫兵“上山下乡”，一部分学生被分配到工厂。不过，和他们文革初期在工厂里作为年轻闯将点燃文革烈火的形象完全不同，这些文革运动的发起者现在是被送去接受“再教育”。红卫兵时代彻底结束了。

但是。红卫兵的语言优势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些文化革命的闯将进厂后，很快又成为工厂的宣传骨干。工厂领导的报告、工作总结，有许多就是出自这些当年红卫兵的手笔。报刊上以工人名义刊登的文章，除了新闻记者捉刀代笔以外，大多是他们写的。真正出于工人之手写出的文章极少。

70年代初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工人理论小组”在全国工厂到处建立。报刊上频见以工厂工人名义撰写的“工人学马列理论”文章及“评法批儒”文章。这些文章的真正执笔者，其实仍是当年的激进学生。

因此，1968年年底以后，大众传播媒介上那些以工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主要执笔者除了新闻记者，仍是当年的红卫兵。只是。为了适应“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宣传需要，这些文章都十分注意使用“工人语言”，还生造出一些语言作为“劳动者的声音”。例如“当码头主人，不当吨位奴隶”，“大雨照干，小雨大干，没雨拼命干”，“拿榔头的手，也能拿设计尺”，“土设备就是能造出争气机”，等等。这样生造的语言，在当时却被作为“工人语言”而广泛传播。“当码头主人，不当吨位奴隶”1975年由上海《解放日报》作为一则新闻报导的标题发表后，这种句式马上被移植到其他行业：“当电机主人。不当千瓦奴隶”、“当机床主人，不当产品奴隶”，成为“批林批孔”时期的时髦语言。

◇ 底层语言的反规范趋向

文化革命语言对中国当代语言所起的长期影响，还在于非规范化口头语言“切口”的兴起。共产党执政后，曾致力于“建立新社会规范语言”50年代初期，报刊曾对“新社会语言”进行过讨论，要求清除当时语言中的“遗老遗少语言”、“庸俗社会语言”及“流氓土匪语言”，遣词造句的规范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这种建立规范语言的努力在建国后17年中收到了成效。但到文化革命中期，1968年以后，许多过去的切口又死灰复燃，重新在年轻一代的工人中流行。而且，还出现了大量新创造的类似切口的语言词汇。这种切口，似乎可以列入反规范语言。这种反规范语言流行的现象在各地都有。这种语言是地方性的，有时甚至最初只在一个小圈子里流行。发明者大都是些被视为流气的青年工人。例如、在上海地区，打架被为“配模子”，身材结实的打架好手叫“打桩模子”，玩女人叫“车拉三”，失败称“刮三”，打人称为“放血”。不加解释，根本不知其意。

文革中流行的反规范语言一反汉语常规，初听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有点象过去黑社会的切口，但在语言功能上又没有黑社会切口的组织联络和组织认同功能。可以说，这种语言的流行，是底层社会对文化革命政治运动厌倦的表现，更是底层社会开始有意识地显现自己，并向主流社会表示自己的不敬、不屑与疏远。过去的17年，底层语言极力向主流语言靠拢，努力使自己显得“进步”，有“社会主义教养”；而文化革命则将一切教养斥为“封、资、修”，与此同时，政治说教越来越空泛，一本正经地重复报纸上的革命语言反显得可笑。于是，一些人便存心使自己显得不合政治标准，另一些人则存心使自己显得愤世嫉俗，创造出许多新的反规范语言。由于这种语言的制造和使用许多都是反主流道德标准的反社会群体成员，所以这种语言的兴起也可以说是反主流文化意识的兴起。

文革中的书面政治语言，是中国人1949年以后政治生活中的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早在反胡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中便已使用。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套话语体系的泛滥才达到

高潮。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语言是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联的，因此一旦政治运动消退，这套话语体系也随之消退。而文革中的反规范语言的兴起，则是底层社会对主流社会不入流的表现。这种心态以后将随着文革后极权统治的削弱而增强。

◇ 结论

同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显著差异相比，中国文革在语言上显得比较平淡。粗鲁的红卫兵使这个时期的语言带上了一种特殊的一致性。这些激进青年努力想代表中国的人民大众，建立起一种修辞风格。这种风格同传统的表达手法有很大不同。

同文革语言相关的社会本体，对其中变化的一部分解释可以简单地从历史中去寻找。当法国革命的目标对准贵族寡头统治时，贵族继承制度却大多保持原封不动，语言的差别因而还是存在。而文化大革命发生于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垮台半个多世纪以后，经过了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基于阶级地位的语言差别在中国已不显著。

文化革命语言单调划一的第二个因素是毛的权威作用。作为一个伟大领袖和伟大思想家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文化革命严重地限制它的文化表现。在这里将文革与法国大革命作对比是很有意思的。法国革命带来了新杂志的大量出版和新戏剧的大量上演。在中国，情况却正好相反。文化革命封闭了上千种杂志，文化革命小组对表演艺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许多规定，只有中央领导认为政治上正确的作品才获准发表。

第三个或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文革期间语言的一致性主要原因，在于一千多年科举考试所牢固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官本位思想。因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说的都是一种官方语言。1905年废除了儒家科举制度以后，千百年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关系也随之松散。1919年五四运动所爆发的文化现象及其后来的结果，揭示出从封建国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力量。在20世纪上半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走向民间，吸取语言灵感和政治动力，由此斩断了他们同儒家先辈的联系。

文革中的语言变化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地位的转变。他们被要求成为普通人中的一部分，红卫兵的语言就表达了这种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地位。一方面，过分地赞扬红太阳毛泽东，反映了中央极权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一种粗鲁举止和语言的行为，则体现了年轻学生被迫努力表现为无产阶级分子的心态。

文化大革命同法国大革命表面上的相同之处，似乎是别于巫术般象征的崇拜、滑稽可笑的模拟审判，以及戴绿帽子的性想象，但在实际上仍有很深的区别。18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中，阶级差异非常明显，而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却不那么明显。除了常挂在嘴上的阶级斗争的口号以外，红卫兵的语言令人惊奇地是没有阶级区别的。这是粗暴的年轻学生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种生硬的尝试。

~~~~~

## 【童年旧事】

文革除了运动没有任何文化

• 叶兆言 •

（叶兆言的祖父是中国文学元老叶圣陶，父亲叶至诚曾任江苏省文联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母亲

姚澄是省锡剧团的著名演员，“兆言”这个名字，就是各取父母名字中的“姚”和“诚”的半边组合成的。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班，获得硕士学位。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了我，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



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地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

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歪七扭八，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的反党言论，有一句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就是“共产党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句话实在太形象了，很引人注目。一起看大字报的小伙伴转过身来，指着我的鼻子申斥：

“这话太反动了，你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也觉得反动，太反动了。

小伙伴气鼓鼓地说：“你母亲竟然要把共产党扔到茅坑里！”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秘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有一次聊天，偶然问起母亲，她大喊冤枉。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父亲也是，我干吗要这么说呢。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

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

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

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里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个人。

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天很快黑了下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个人待在宽宽大大的厨房里，真有些害怕，于是便跑到大街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一夜。或许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出走吧，自记事以来，还从未一个人离家这么远过，更没有深夜不归的经历。我为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反动家庭感到羞愧，决定离开，决定跟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彻底决裂。夜色降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身无分文，茫然地在街上走着，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哪儿好玩便往哪儿钻。这一夜，遇到的稀奇古怪，要一笔一笔说清楚，还真不容易。大街上灯火通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轮番演出活报剧，给我留下最最深刻记忆的，是一段轻松活泼的天津快板书。在当时，再也没有什么比快板书更适合街头宣传，说书者戴着个大鼻子扮演刘少奇，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提起了刘少奇，他不是个好东西”。这词非要原汁原味的天津话说起来才有趣，快板噼噼啪啪地响着，听众一边听，一边乐。

不远处，造反派正慷慨激昂辩论，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斗嘴吵架。那时候，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辩论者唇枪舌剑，不时地听见有人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就是讲道理，可是讲着讲着，就都不讲道理了，袖子捋了起来，拳头举了起来。眼看着要打起来，不知怎么的，又突然不打了，双方握手言和，然后又接着与第三方大吵，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说什么好得很，一方就大喊好个屁。广场上“好得很”和“好个屁”此起彼伏，谁都不肯示弱。我一直没弄明白“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好得

很”这一派后来被称之为“好”派，它的对立面就成了“屁”派，“好”派“屁”派是南京两大造反组织，都出了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

那漫长的一夜可以分成两部分，上半夜都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下半夜与革命就有些距离。随着夜越来越深，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要饭的，都形迹可疑地冒了出来。耍猴的一个劲数落一只老实巴交的猴子，就像教训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几个大人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边看边笑。卖狗皮膏药的开始推销自制的肥皂，吹得天花乱坠，把机油和泥土往一块白布上揉，然后现场清洗给观众看，引得看的人赞叹不已。要饭的在数自己挣的钱，把硬币一枚枚摊在空旷的台阶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在树荫深处，竟然还有一个男人在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奇怪他尿个尿，干吗要那么复杂。

重新回忆这一夜，总有一种荒诞之感，连我自己都觉得它不真实，然而又确实都是亲眼所见。一群小流浪汉合伙来，不费吹灰之力，就骗走了我脚上的新塑料凉鞋。他们是我新结识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广场上玩，从东窜到西，又从南玩到北，很快变成无话不说的小战友。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喧嚣的热闹劲过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伙小流浪汉郑重其事接纳了我，开始对我天花乱坠，哄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心荡神怡，对未来产生了太多美好想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飞舞，我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相信他们真能带我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家伙是个瘸子，是个能说会道的语言天才，他自称是老红军的后代，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我对这家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我，说什么我都敬若神明。最后他对我下达命令，让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汉一样，在银行门前的大平台上躺下来睡觉，他让我把凉鞋脱下来，当作枕头垫在脑袋底下，理由是这样不容易被偷走。

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搁在脑袋下面，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在蜜一样的梦中，我梦到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爬山涉水，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声，我的鞋子被挤掉了，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拥去，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我已从平台的这一头滚到了另一头。我的鞋没有了，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影无踪。

最后，我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结识的小流浪汉给耍了，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转眼间被糟蹋得干干净净。他们偷了我的凉鞋，兴高采烈逃之夭夭，像沙滩上的水一样蒸发了。我的失踪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也让造反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失踪负有责任。我的父母还关在牛棚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造反派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分头在找。他们担心我被人贩子带走，落入坏人之手。我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虽然已经与我母亲决裂了，毕竟还有些残存的师徒情谊。她们像对待英雄回归一样地欢迎我，让我先饱餐了一顿，然后围着我七嘴八舌，一个劲地追问我把鞋子丢到哪去了。我结结巴巴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们听得一惊一乍。对于她们来说，这只有惊无险，只是弄丢了一双鞋子，鞋子丢了，孩子还在，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吃饱喝足，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演员英姿飒爽地走过来，把我从母亲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头目，是兵团的什么司令，穿一套草绿色军服，系一条地道的军用皮带。那时候，造反派全是这身打扮，真能穿上货真价实军服的人并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仅仅凭这套行头，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在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军服，大多是仿制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绿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后，因为褪色，像迷彩服一样肮脏不堪。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着一种

地位。

造反派小头目正和一位现役军人在谈恋爱，她身上的军服就是那个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觉得最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最能引起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场景，莫过于绿军装与红袖标的配合。民间有“红配绿，丑得哭”的说法，南京方言里“绿”和“哭”搁在一起，不但押韵，而且朗朗上口。红和绿在颜色对比上，既尖锐冲突，又十分和谐。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红袖标像鲜花一样灿烂。身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小头目神情严肃，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宣布：

“好吧，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小家伙交给我了，我有话要对他说。”

女弟子们立刻都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她要对我说什么，看看我，又看看她。

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只是预感到会有些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依依不舍地看了女弟子们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来的谈话，对于一个九岁孩子产生的强烈冲击，丝毫不亚于抄家。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兴奋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说你并不是现在的父母生的。她说，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她有些幸灾乐祸，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坏人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她接着说出了个更让人吃惊的秘密，她说你知道，事实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你的父亲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为了人民英勇牺牲，已经长眠于地下。

我不相信造反派说的话，又没办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仿佛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一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在美丽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园，我看到了亲生父亲的墓碑，这个困惑了自己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解开了答案。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痛苦，还是麻木。对于一个九岁孩子来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极端，极端得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突然之间，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动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后又是突然之间，原本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们竟然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记不清楚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造反派小头目从头到尾，都没有拿我当作外人。她挑唆着我与养父母之间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要对得起那位为革命捐躯的亲生父亲。她说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撑腰，党和人民站在你的一边，做你的坚强后盾，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她说你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来。

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扮演我父亲，一会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你父亲是个大右派，你母亲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听见了女孩子吃吃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亲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现在，这个虚拟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经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们的游戏很快进入了高潮，小女孩举起了拳头，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号，异口同声慷慨激昂。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好像被心爱的人背叛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笼罩在心头。真想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她。我要告诉她，我依然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亲生父亲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做，就算我说了，她能相信我

吗？我不相信她会相信，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激烈的年代，革命是头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换了任何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上，都应该被讥笑，都应该被诅咒。

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

后记：八个样板戏我一向深恶痛绝，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再听到它的声音。仔细想想，《江姐》与样板戏相比，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文化大革命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没有结束。

□ 原载“中国经营网”

~~~~~

【往事如烟】

农民造反记

• 张治凡 •

◇ 进城

我那年16岁，今年60岁，44年一瞬间……

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被尖锐的“嘟嘟嘟”的哨子吵醒。只听见生产队吴队长一边吹哨，一边喊叫：“全体社员到公社拖拉机站集中，到上海造反！有工分的。”我心底一阵兴奋，赶紧穿衣起床，匆匆喝了几口麦片粥，奔出门外，约了连兴等伙伴，赶往拖拉机站。

天气很冷，屋顶上、地上、稻草柴垛、一片银霜。路上不见行人，偶尔从远处村庄传来几声鸡叫。

林宝妈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询问：“你们做啥去？”“造反！上海造反，记工分的，快去！”“造反？”“与你讲不清，去了再说。”林宝妈满脸迷惑的样子。

时间还早，拖拉机站只有几个值班的，七点以后，陆续来了不少农民。

大家高声地互相招呼，拖拉机站开始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围着圈，在场地中央高谈阔论“王洪文现在不得了，工总司厉害！”“听说市委现在被砸烂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那个姓蒯的到上海来了！”

人人都在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唯恐落后，偶尔也冒出一句“看你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昨晚肯定跟你老婆太那个了！”于是开始说下流话，引起阵阵哄笑。

几个老头缩在墙脚边，破旧的棉袄中间束根绳子，这样感觉暖和些。他们大多抽着劳动牌香烟，一声不吭。

姑娘们则对“绞花棒”式样的绒线衫织法感兴趣，相互翻看衣裳，品头论足。

空气中弥散着劣等烟草味，过会儿，有个公社来的头头模样的青年咳嗽了几声，爬到一辆拖拉机车厢上挥挥手，情绪激动地说：“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上海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宝山分部杨行支部组织大家到上海造反，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这个反我们造定了，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开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车厢下的男男女女情绪高昂，挥舞着红本子，跟着头头高喊口号，大家忘记了寒冷。头头顿了顿又说：“到上海造反，有吃的，有住的，大家放心好了，现在去领造反队袖章，凡是四类分子一律不准参加造反。”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抢袖章，有了这“造反队”字样的红袖章，就好象有了一切似的。

我拼命挤进人群，好不容易也抢了一个，往手臂上一套，发现袖章上油漆字迹还未干，一定是昨天晚上匆匆赶出来的。戴上袖章后，我似乎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感觉。

此时，我穿一套旧军大衣，稍长了点，那是在公安局做事的叔叔送给我的，戴一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军帽，上面还缀着红五星，胸口佩着一枚用两包香烟换来的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算是最时髦的装束了。

我兴奋地爬上第一辆拖拉机，车头里已挤满了人，我只好坐在敞蓬的后车厢，车厢后面绑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几辆塞满男女老少造反派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向市区开去。

进入市区后，我们开始往车后抛传单：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集体的人民公社改为国营农场！
坚决要求提高薄荷油的收购价格！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决要求兑现饲养母猪的奖励政策！

当初我就觉得这些又想革命，又想实惠的口号似乎不太对头，与我数月前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串联时所了解的革命大方向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地将手中的传单全抛完了。

大家都很开心，车上有个老阿婆兴奋地说：过去在家里一直受老头子的气，这一次可出气了，我也造反了，饭也不烧了！

拖拉机在市中心南京路上向外滩驰去，警察似乎也不管，几个小青年从弄堂里窜出来，油腔滑调的高喊：“大家来看啊，阿乡造反派来了！阿乡轿车来了！”上海人喜欢称拖拉机为“阿

乡轿车”。

我们坐在车上得意地仰望着两旁的高楼大厦，无视车后的上海人，昔日那种乡下人三等公民的意识已荡然无存。心里只是想：我们也是造反派，我们今天来了！投身到这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了！

拖拉机在外滩中山东路停住，头头让我们下车休息，等联系好住宿再说。我们这些与周边人服饰、神态显然不同的造反派坐在马路旁，东张张、西望望，经过的上海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流露出嘲笑的目光。

等了老半天，头头终于出现，他领着一大群穿着土里土气的老乡，进入了那幢昔日的汇丰银行，文革前的市政府，现在的造反派占领的革命大厦，真有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门口非常拥挤，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是穿黑棉衣说卷舌音普通话的北方佬，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来了！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中从未进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大厦，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楼梯，长长的走廊如同迷宫，阿秋妈妈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说：“喔哟！我头也晕了，走不动了！”，那豪华的拱顶，连见过市面，跑过码头的陈牛皮也呆住了，他望着屋顶，一句话也说不出。那精雕细琢的立柱，似乎过去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见到过。

进入房间，地板上过蜡，油光打滑，庄家宅的阿根一进门就扑通摔一跤，他一边喔哟喔哟叫唤着，一边摸摸地板说：“走这地板最好穿双草鞋。”房间里有暖气，十分惬意，我把棉大衣脱了，拉过一把椅子，让连兴坐在椅子上，我拖着椅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滑来滑去，大家开心极了。

到了晚上，住在另一层的永珍、阿妹、阿兴过来串门聊天，在乡下，我们也是这样的。

夜深了，海关大楼的钟声，黄浦江上的气笛声，搅得我们一夜未睡好。

造反的第二天，头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来到华山路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只见头拿着一张什么人签过的批条，与厂里的头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直接到车间里，从一排排的铁架子上，将面包往麻袋里倒，装满了一车厢后，坐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我一连吃了三个鸡蛋面包，第一次品尝刚出炉的面包，真香啊！

当晚，我自恃在上海住过的老资格，带领一群伙伴去找“大世界”，其实“大世界”已经关门停业，我们在乡下哪能知道？我们顺着南京路往西走，马路两旁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从十几层楼上挂下来，触目惊心，数不清的“造反司令部”、“革命委员会”、“战斗队”的旗帜伸出高楼的窗口，在寒风中飘扬，黑暗中时不时地从天空飘下红红绿绿的传单，纷纷扬扬，使人想起“战上海”电影中，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南京路上突然撒出一大把传单，令人激昂万分。

我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观望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脚下似乎踏翻了什么，一个男子粗暴地大吼：眼睛瞎了！你要吃生活是伐！我赶紧往小弄堂逃去，奔了好久，才放下心来。

由于迷了路，当晚，我找了很久才回到外滩住地。进入房间，我把路上捡来的传单和隔壁房间不知什么造反派留下的“宣言”、“严正声明”，还有一大迭“我的检查”，统统拿到窗台上，打开窗户，用力往外一撒，传单随风飘扬，马路上人们抬头仰望，当传单落地时，路人争相抢

夺，乱成一团，汽车喇叭声齐鸣，我看着这一形景，真的开心极了。

造反的第三天，算是正式行动，头吩咐我们在外滩排队集中，不要忘了带袖章，每人还发了一面有革命标语的小旗子。

约九点多钟，队伍总算出发了。我们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起先三、五人一排，后来变成了六、七人，最后队伍塞满了南京路，队伍走走停停，有人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侧的楼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行至西藏路，整条南京路都是游行的队伍，首尾不能相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扬，口号声、歌声震天响，气氛十分热烈，场面颇为壮观，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会激动，连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老头、老太也异常兴奋，似乎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队伍走得很慢，当我们走到静安寺，已是下午一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

走到旧市委附近，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也许没听清楚，也许不知道曹、陈究竟是谁，队伍里几个青年大喊：“打倒曹小弟！打倒陈牛皮！”曹小弟、陈牛皮是村里的社员，比较出名，念起来较顺口，于是队伍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走到淮海路，有许多人悄悄溜了，队伍稀稀拉拉，口号声也变得有气无力。

送面包的终于来了，阿发一边举着旗子，一边嘀咕着：“说好发四个面包，怎么才发二个呢？”此刻游行队伍已经涣散，领头的也不知去向，激动的口号已经喊过了，面包也吃完了，不知还让我们干什么？

此时，惠芳阿嫂郁郁地说：“这两天我女儿不知怎样了？我想今天回乡下去，实在放心不下。”说着就扔下旗子溜了。

造反的第四天，我们在窗口架了一个高音喇叭，对着外滩广播“农民宣言书”，但很快被周围红卫兵组织的几十个大喇叭的广播声淹没了。我们则呆在房间里无事可做，在地板上滑来滑去的游戏已觉得无聊，房间里的传单全撒完了，虽然晚上睡觉有暖气，但大部分队员都感冒了，在乡下很少感冒。福根最担心上头来向我们收面包的粮票、钞票，红兴阿哥怎么安慰，他也不信：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呢？造反就能够白吃白住吗？

抽水马桶常常堵塞，清洁管理员也找不到，听说都到北京告状去了。为何告状，谁也说不清。乡下来的造反队员越来越少，我可不想回乡下，父亲参加什么“支农职工造反派”，也在市区里，经常来看我，哥哥此时正在步行串联到北京的路途中，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了。再说，我们的革命行动还没有什么结果呢。

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星期，接到上面通知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什么“最新指示”。反正，我们得全部回家。

回乡下的路上，拖拉机开出市区，郊外寒风刺骨，我坐在拖拉机车厢一角，紧缩着脖子，数十天热哄哄的感觉，一下子全消失了，我数了数旧书包中十来个又冷又硬的面包，心想，这便是我进城造反的全部收获了。

坐在旁边的阿秋妈妈，望着远处的田野，自言自语地说：“唉，家里的棉花还没摘完呢？”

补记：当时我所在生产队的名称是上海宝山县杨行人民公社东街大队沈桥小队。这次到城市的造反行动，因为记工分，算出勤，生产队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参加了，好几十个，整个大队好几百人，在市府大楼住满了一层。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为什么造反，只是队长吹哨子喊出工的，但到了市区，感觉很有趣很新鲜。

◇ 掘墓

我老家在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东街村，文化大革命期间叫宝山县杨行人民公社东街大队，杨行镇往西三里路有个公墓叫宝安公墓，占地约三百亩，当地人称公墓为“三百亩”。

公墓很久以前就有了，小时候去公墓玩耍，感觉里边地方很大很大，有些墓地很考究，大理石雕琢的墓碑，刻着“先妣先考”之类的陌生字。

解放以后的杨行镇已经没有富人，农民都赤贫，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辛苦干活一年还欠生产队钱，家里死了人，没有钱在三百亩买墓地，一般都草草埋葬在荒地里或火化，所以，三百亩里埋葬的绝大部分是城里人。

每年清明节，城里来很多人扫墓，60年饥荒年代，往往祭祖的供品刚刚摆上，等候在旁、衣衫褴褛的孩子一哄而上，抢个精光，一边往嘴里塞馒头、一边四散逃奔……

有次我看见墓地旁停了辆乌黑锃亮的轿车，很好奇轻轻地摸了下车子，司机立刻骂骂咧咧地追打过来……所以，长期以来，我对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感到很郁闷……

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政府机关全部瘫痪，造反派唱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的毛主席语录歌，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城里忙着夺权。

乡村里的农民也琢磨着做点什么……

生产队严队长召集我们社员开会，说三百亩里都埋葬着“封资修”，我们要将封资修革命掉！封资修占着土地又不生产粮食，我们要响应毛主席老人家“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指示，彻底改变三百亩死气沉沉的旧面貌！今天，我们就去三百亩掘墓！大家都去，记工分的，早中餐免费！嘿嘿！！

我想：那开黑色轿车的上海城里人该倒霉了，祖宗的墓也要被翻朝天了，心中不免有一丝快意……

当天，生产队至少有三十名社员出动，带着铁锹、钢钎、绳子、杠棒等工具、乘着小拖拉机，径直向西开去。

到了公墓，只见几百亩地的墓园，人山人海，掘地的、撬棺材的、男女的欢呼声、拖拉机的突突声，此起彼伏，热情朝天，到处是写着“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旗。

严队长看我年纪小（当年我17岁），就分配我勘察墓地，墓太多，要挑选好一点的。我就

拿一根钢钎，东戳戳，西探探，队长告诉我，解放后的墓地就不要了，基本没有什么钱财的，于是我就看墓碑上写着民国字样的、墓碑华丽点的，用钢钎戳到棺材，听听声音是否“咚咚”响，证明棺材质量比较好，然后我就在这墓地上插一面红旗，做个标识。

转了一大圈，估计也勘察了十来个，回来竟然找不到自己勘察的墓地了，原来其他来掘墓的队伍也是这样干的，到处都是插着红旗的墓地……因此还发生了与邻队强夺墓地的争斗。

队长指挥着男女青年社员，用铁锹将墓地表面的土铲去，考究的墓，往往还有砖砌或钢筋混凝土的椁，很坚固，需要用镐、榔头敲打老半天才打开。

好的棺材很沉重，需要将铁链从底下穿过，用神仙葫芦（一种铁制的起重设备）将棺材吊起，移到墓穴外，用铁棍将棺材盖撬开，仔细地检查，一般重点是头部、手腕、看看有没有玉器、金银首饰。

有个姓高的社员，站在棺材的侧板上，俯视着下面的尸骨，发现牙床间有金属，用手扳下来，在自己的衣服上一擦：嘿嘿！是颗金牙、成色不错啊！

有些尸体保存很好，一点也没有腐烂，于是社员将尸体从棺材里倒出来，有时尸体吸附在棺材底下倒不出，就用四个钉的铁钯将尸体扒出来，顿时、肢体分离，红色的尸肉混夹着泥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很多社员不能目睹这可怕的、凄惨的景象，放下工具，掩住脸面……

但也有大胆的，总得有人干活嘛！

很长一段日子，我一看到红烧肉，眼前就浮现那红色的、湿漉漉的尸肉，一阵恶心，难以自制……

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经常看到军队将城池团团包围，城里军民坚守，岿然不动，任由城外敌军谩骂。

于是围城敌军想出毒计，将城外墓地掘开，暴尸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城池军民痛哭流涕，悲愤难忍，出城迎敌，遂中计，城破国亡。

三百亩墓地遭到以革命名义下进行的集体抢劫时，城里人也悲愤难抑，于是几辆卡车的工人，打着“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旗帜，戴着安全帽，拿着铁棒，全副武装，来到墓地，停车一看，墓地的农民成千上万，都拿着铁锹榔头铁钯，破旧立新的红旗招展，看到这轰轰烈烈的阵势，造反派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就快快地撤退了……

棺材分解成六块，装上拖拉机，运回生产队，堆在仓库旁的空地上，几个有权的干部盖房，城里来的插队落户学生住房，都是用棺材板材盖的，生产队的乒乓球桌台，也是棺材板制作的。

掘墓得来的金银首饰，生产大队开具了证明，到银行按重量收购，换成人民币现金，作为生产队收入，参加掘墓的社员都记了工分，掘墓一天大概有四毛钱的收入。

我因为刚从学校出来，不算正式社员，只分到了半斤糖果。

三百亩公墓附近的农妇，从家门口开始，踩着一块接着一块的“先考先妣”墓碑，走到小河边洗刷……

一九六七年的整个冬天，三百亩公墓尸骨遍地，暴露在河坡上、荒野间，任由野狗老鼠啃咬……

失学的孩子们将头颅踢来踢去，玩的很开心，并不在意脚下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春天来了，杨行与周边地区爆发脑膜炎疫病，生产队严队长也发病了，死了很多人，或许是三百亩公墓的孤魂野鬼在作祟……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所有的公墓包括万国公墓都遭到了劫难，连宋庆龄父母的墓地也不例外。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十七岁的青年演变成六十岁的老头了，文革的灾难已经过去，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也希望所有的中国人不要忘记。

记录下这段历史，我所参加的抢劫行动，谨向上海宝安公墓原来的业主谢罪，愿那些被惊扰的灵魂安宁……

阿门！

□ 原载《民间历史》网

~~~~~

【史实辨正】

请勿轻易下结论——与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商榷

• 薛开震 •

几年前在网上看到《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一文，文中说：“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多年来，这则材料通过网络流传，但真伪难辨。近年来，在《炎黄春秋》上读到阎长贵先生的几篇佳作，受益匪浅；2009年又在8月21日的《生活文摘报》上看到向继东对阎长贵的访谈录《秘书眼里的江青》（原载《南方周末》），阎长贵说：“毛远新现住在南昌照顾98岁高龄的老母亲朱丹华，我曾给他打电话询问……”由此，我突发奇想：阎先生应当就上述历史传闻询问一下毛远新。由于与阎先生从未谋面，无法联系，11月18日我便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并附上给阎先生的信，请他们转交给阎先生。

2010年1月31日下午，阎长贵就此事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证据来！”之后，阎长贵、杨银禄又结合前几年与汪东兴女儿汪延群联系、询问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文中最后一句话是：“核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然而，笔者查阅了有关书籍与网文，却认为此结论下得有些匆忙、草率、不严谨。只因为

毛远新先生的回答是不符合已经公开的史实（包括他自己留下的一些史实记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请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3章《临终的日子》里就引用了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见该书第1766—1767页）

该书还引用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毛远新笔记）》，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该书第1777页）

该书该章还多次引用了张玉凤的两篇文章：《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此两文中就有毛泽东在1976年的谈话。比如，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毛泽东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该书1781页）

张玉凤回忆：1976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该书1766页）

又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清明节（4月4日）前后，“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该书1776页）

该书该章还引用了毛泽东1976年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的那篇长话（该书1781—1782页），但具体时间与召见人则语焉不详，仅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其他书籍中则说得较详细，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见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版，第720页）辛子陵引用的这番话与逢、金《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引基本一致，只是辛子陵书中多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这11个字。毛泽东的这番话，不算标点符号，也有二百多字，这说明1976年6月15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语言表达也是很清晰的。与此情况相对应的是，张玉凤另一篇文章中披露的两件事——

1993年12月24日晚，张玉凤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委托本校教师）邀请，作了一场即席演讲，回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亲身经历的珍贵历史。其录音整理稿经张玉凤本人审阅，在事隔14年之后，于《社会科学论坛》首次发表，题曰《张玉凤首次披露：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此文我前两年曾在报刊上读到，近日在网上重读一遍。该文说：1976年6月1日，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好在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毛泽东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下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从上述张玉凤的文字中看，毛泽东从1976年6月初到1976年7月底，头脑很清醒，说话表达也没问题。既然如此，毛泽东若是在1976年7月15日口授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岂不是完全可以正常说两遍的嘛！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两点判断：一、毛远新先生2010年1月31日下午的那番话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自圆其说；二、阎长贵、杨银禄先生那篇文章中最后所下的结论也就显得太草率，似乎不能成立。特写出来，供关注这则历史传闻真伪的人们参考并诚望批评指正。笔者这样做的目的和希望，借用阎长贵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

□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  
【史海钩沉】

毛远新与1975批判邓小平

• 金冲及 •

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大寨大队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九月十五日大会开幕那天讲话。他说：

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9月15日。）

邓小平这个讲话稿在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会议代表。

十七日，本来同大寨会议不相干的江青，也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并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一些人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讲评《水浒》。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都占据了领导岗位。江青这些话的意思讲得十分露骨，是说周恩来、邓小平架空了毛泽东，四届人大使一批老干部占据了领导岗位，煽动人们起来打倒邓小平，让她把权力再夺过来。

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他谈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谈评《水浒》的情况。毛泽东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这以前，毛泽东在华国锋请示说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时，明确表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二十五日，邓小平将他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经毛泽东批准，讲话稿印发会议代表。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这时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这些消息在社会上很快传出。人们普遍抱着热切的期待。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很好的局势却在短时间内陡然逆转。

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在这场逆转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抗战期间，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毛远新小时候住在毛泽东家里，是毛泽东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受他喜爱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刚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他因为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路过北京。十月十日回来时就留在北京，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非正式的联络员。

那时，毛泽东接触的人很少。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想起而不能起的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笔记，1975年9月11日。）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一直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毛泽东的重视。他那时接触实际很少。在他看来，毛远新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此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在八月间和十月间给毛泽东两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信是通过邓小平转送的。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的不满，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相当一批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人。

这一点触动了毛泽东晚年最敏感的问题。他曾多次说过：这一生中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后来也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他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而且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九年了，所以他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支持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并且批评江青等人；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异常关注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毛远新的话，刘冰等的信，恰好触动他内心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所以会突然发生逆转的原因所在。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

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他所说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他认为刘冰等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年10月19日。）

毛泽东要求由几个人开会帮助邓小平。他对毛远新说：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他还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年11月4日。）

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态度，在内心充满矛盾：不是要打倒邓小平，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使其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难以再唱反调；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使他有个转弯的机会，但邓小平却以我是桃花源中人（指他被打倒六年，脱离运动），不了解为词，委婉地拒绝主持作这个决议。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道：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27页。）

这样，批邓就从开打招呼会开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在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是，邓小平一年来主持的整顿工作深得人心，各地、各单位的绝大多数人对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抱着不满和应付的态度，邓小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原来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去浙江和上海的情况下接替主持中央工作的，这时王洪文回到北京，邓小平在十一月十五日向毛泽东写报告，提出仍由王洪文主持工作。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的批语，1975年11月15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东西。可见，毛泽东此刻的心情仍陷于难以摆脱的矛盾之中，而且对王洪文已经失望，不愿将权力交到他和四人帮手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